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

裴长洪 刘洪愧

摘要: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的经典论述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逐步走向成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生成机理、经验特征和发展趋势。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跃迁创造新的现代化文明条件。其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但还要从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际出发。发达国家关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指标值得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简单照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具有世界意义,为其他国家提供了现代化道路新的选择。

关键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小康社会;新发展阶段;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7-0001-1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和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发展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在这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历史过程。认识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规律,尤其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演变逻辑,进而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特征,就成为研究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现代化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2]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运用,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原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由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及理论机制研究”(72003193)。

作者简介: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洪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地螺旋式前进。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3} 与此相对应的有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应于每个文明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而形成了各种文明形态的差异。马克思的论断主要以欧洲经济史为依据，以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为背景。他很快发现，在这种遵循一般规律的运动中，蕴含着东西方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不同特点。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证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形态并不完全重复欧洲的样式。他借用地质学的名词描绘这种情景：“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4]831} 马克思对当时的俄国进行了系统的专门研究，发现俄国农村公社具有与欧洲不同的特殊性。当时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时期，因而他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4]830}。马克思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方国家的社会变革未必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阶段，其取决于东方社会自我发展中各种社会矛盾的力量对比。特别是，虽然马克思没有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形态演变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基本分析逻辑仍然适用于中国社会。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虽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状态，但是小农经济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地区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比重。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也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新生的规模较大的无产阶级工人，它们是新的生产力代表。但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阶级的双重压迫，后两股势力不允许中国走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也是中国自鸦片战

争以来的各种资本主义革命都无法成功的原因。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事件。最先觉醒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社会革命改变中国的面貌，走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的社会发展与俄国完全不同，更与马克思经典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如何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目标和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从党的二大到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通过近20年的实践，才系统认识和总结了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都是以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矛盾为前提的。毛泽东同志把“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5]611}的认识和理解看作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社会缓慢地独立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被中断，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现了帝国主义控制经济命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无产阶级和不同成分的资产阶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因而中国革命需要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保障。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否建立以及如何建立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必然是武装斗争这两大战略。“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5]605}而农民战争的性质，又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战略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战争形态是从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毛泽东同志总结道：“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

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5]605-606}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时代之问是:如何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和战略是什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突出任务仍然是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大量的工作仍然是党同农民的关系。这仍然需要以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为起点。依据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关系,资产阶级可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代表,其政治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打倒,其资产和财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被相继没收,转化为新中国的国有资产。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导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在经济上,它有发展生产、发展民族现代经济的进步性,又有剥削工人的落后性;在政治上,它有同情、支持甚至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步一面,又有软弱、动摇、妥协的另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医治战争创伤与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党的任务和主要目标是调动各方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对于民族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不违反政府法令和规定的前提下,党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同时在农村鼓励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

追求国家工业化目标是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梦想。工业落后就要挨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记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设想了新中国的建设目标是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因此,在实现国民经济恢复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把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党的“一化三改”总路线正确回答了这个时代课题的开局问卷。1953年6月,毛泽东同志把它正式表述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

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6]农民曾是中国革命的同盟军和主要社会力量,因而中国共产党认为广大农民蕴含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应当采取鼓励、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策略。而针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特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方针,通过公私合营的赎买方式,使私营工商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混合经济。

在“一五”计划期间,党对新中国的建设目标逐渐清晰和明确。1954年周恩来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7]。这是我们党最早的有关现代化的表述。毛泽东同志最早认识到实现这个目标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他说:“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8]因此,他在中国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1956年1月,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建立”和“建成”阶段的区别。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9]116}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八大,它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可见,

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以及各个阶段主要社会矛盾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和战略、策略的基本前提,这个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历史逻辑所证明了的。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列宁,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若干阶段,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等概念,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很快建成“发达社会主义”^[10]。1979年9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1]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说:“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1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3]。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14]。1987年8月,邓小平同志再次作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判断:“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5]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

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16],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经济制度和体制方面包含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深刻内涵。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脱胎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政治最突出的特点是在有节制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在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很长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很快发生根本性的提高,因而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对民族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方针、对小农经济和城镇个体经济实行引导“互助合作”方针,从而继续利用它们发展国民经济的积极性,这是正确的。但在其后,是迅速使它们走向消亡,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和鼓励它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利的一面,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很明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3]1979—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在不成熟中走向成熟,需要在不完善中走向完善,纯粹的社会主义模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从现实逻辑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和斗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人民

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也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根本任务。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形式,这是生产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看,现实中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具有两重性:它既有利于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扩大垄断资本的势力范围,把更多国家纳入它的控制网络的一面;同时,它又有促进世界生产力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建立国际商业文明、创造国际交易工具和规则,规范国际交易秩序等进步的一面。认识和把握这种两重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利用外商投资也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规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战略是从最现实的经济规模总量和人民温饱水平着眼,这包含了生产力与社会发展两个内涵。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小康”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名称。在“小康”战略目标中,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个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世纪末,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国成功实现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但是,当时达到的小康目标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不平衡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17]。虽

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动态发展过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分辨这个过程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依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依据这个判断,党作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年脱贫攻坚,并顺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决策。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存在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变化,必须不断有新的战略目标与之相适应。同时也说明,“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实际上内含了承前启后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与世界共性的一面,也有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殊的一面。

三、“小康”社会发展战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成果的主要标志,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逻辑。因此,接下来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和发展。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遵循世界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可以缩短现代化的时间,而且可以避免现代化的陷阱。这已经被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所证明。

第一,缩短了工业化的进程。现代化肇始于工业化,英美等西方国家最先完成工业化,并由此建构了与之配套的社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成为当今被普遍认同的现代化文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工业化不仅是新的科学

技术所孕育的物质生产,而且需要用它的产品装备来改造国民经济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如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这是工业化的本质。它与建立一些工业企业、有一些工业生产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第I部类生产增长快于第II部类生产增长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注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协调发展,但也仍然坚持说:“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9][21]}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首先要遵循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而未必遵循客观规律。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是从轻工业即生活资料部门起步的,这就注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从18世纪下半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工业化,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完成工业化,前后经历了200多年。新中国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的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主要大国,1953—195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8%,同期苏联为11.6%,美国为3.6%,英国为3.8%,联邦德国为10.1%,法国为7.9%,日本为15.0%^[19]。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我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中国仍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30年)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此后,工业化迅速普及和提升,“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20]。

第二,抓住机遇迈向信息化文明。工业文明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后阶段,完成工业化以后,生产力发展向何处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普遍经历了后工业

化社会,即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并非都能成功实现现代化,相反,一些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高的发展中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原因是服务业的发展可能只是社会分工的扩大,有些只是工业企业内部分工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分工的扩大并没有得到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催生的新物质技术装备的支撑,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远低于工业生产率的提高,造成总的社会生产率对比工业化时期反而下降,因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后工业社会经济的服务化和城市化,实际上是对现代化发展的考验,而非成功的标志。

以美国为首的最发达国家虽然最先进入服务业比重上升阶段,出现了产业空心化,但这与发展中国家有本质区别。一方面,它们有条件依靠金融资本的优势和全球扩张,通过金融全球化得到巨大的资本回报。金融交易的高度虚拟化和泡沫化以极高的速度实现价值交换,从而得到“增加值”和资本利润。另一方面,它们利用通信技术应用的突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掀起一轮“新经济”热潮。在信息化的初级阶段,这主要表现为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如电脑、电话的使用和普及,互联网的出现及在工业领域的应用,网络传输速度的不断提高,并逐渐出现单独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在信息化的高级阶段(也可称为数字化阶段),由于数字技术的进步,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通信技术在工业中的简单运用,包括5G通信、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等在内的技术的出现,催生出了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使得数字技术可以对工业和实体经济进行更大范围的改造,更大程度提高生产力。此外,各类平台企业大量涌现,“数据”已经成为新的要素,不再仅局限于传统上的统计功能,它还可以用来指导生产活动,包括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等问题,引起了一系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由此,人类社会

已经逐步迈入数字文明时代。美国等最发达国家凭借科学技术和产业的优势,得以保持现代化的领先地位。一些小型经济体(如韩国、新加坡)由于得到发达国家的信息化产业的辐射和延伸,摆脱了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困境,因而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那么幸运。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期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普及和提升阶段,尽管如此,也开始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工业比重上升趋势的现象,但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生产力新时代文明的到来。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8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我国迈向信息化文明时代的经验:“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21]159}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再一次显示了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中国在不到 20 年时间里,信息化发展的若干重要指标已经逼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从而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数据,中国互联网使用人数比重、固定宽带使用人数比重分别从 2000 年的 1.78%、0% 上升到 2020 年的 70.64%、33.6%,已经与美国(2019 年分别为 89.43% 和 34.73%)、德国(2020 年分别为 89.81% 和 43.02%) 和日本(2019 年分别为 92.73% 和 33.5%) 相差不大。中国移动宽带使用人数比重则从 2010 年的 3.44% 上升到 2020 年的 96.32%,也与美国、德国和日

本没有实质差距。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必然要警惕单纯地在“资本—价值增值”的圈子里循环。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是“三大失衡”,其中一个就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由于“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大量游资寻求一夜暴富”,“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21]114}。对“三大失衡”的分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准了方向,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道路有效防止了产业空心化和“脱实向虚”。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为 27.4%,美国为 16.8%,日本为 7.5%,德国为 5.4%,其余各经济体占 42.9%^①。2021 年,这一比重还在继续上升,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27.4%,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22]。

(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兼容并包

从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基本实践和理论认识来看,我们不断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全社会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分配结构及其实现形式,并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战略目标。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3]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第一次正式表述。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观点,并指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

①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21]62-63}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赖以运行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的运行平台,两者相辅相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24]这种新概括,把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综合起来,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基本实践。

在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得到保障,进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保护和促进的作用。这种制度安排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分阶段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5]。但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指出:“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不要发展了,也不是要搞杀富济贫式的再分配。”^{[21]12}他进一步论述了共同富裕问题的本质、特征和实现途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6]。因此,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同时,也必须注重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在做大蛋糕中切好蛋糕,初次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初次分配

中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需要处理好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关系,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再次分配对于调节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和财富过大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因而有必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其精准性。同时,要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三次分配是基于社会成员自觉自愿的行动,要通过自愿捐赠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方式进行社会救济和社会互助,有利于改善分配结构,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国家税收政策可以对自愿捐赠等公益慈善事业给予适当鼓励,但不要带有强制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到2035年,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完善

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中国的改革逐步向上层建筑领域拓展,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实践不断深化,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国防军队等上层建筑领域。这种全方位的改革,其总目标就不仅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领域的事情了,而是“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其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7]。这是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的拓展,成为“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确定为依法治国,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提高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高度来认识。

中国的实践和理论说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含义是用法律、制度和规则来规范党与国家、公共权力与社会、资本与劳动、公民与社会、多元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多民族、人与自然、国家与世界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相互关系。这是对现代化的新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它极大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新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全世界有不少共同点,中国国家治理的特殊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它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以人民为中心的各项立法精神,因而需要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规律;第二,它坚持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两点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划清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界限,防止公权对公民的侵犯,需要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一点中外皆然。但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和对劳动者、社会的侵害,把资本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伟大的创造,产生了各种形态的社会资本,既有公有资本,又有各种非公有资本。资本的特性是与劳动相对立,公有资本虽然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但由于管理者的蜕化变质,也会对劳动者造成侵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非公有资本与劳动者的对立依然存在,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规则加以约束,

也可能造成对劳动者的侵害。资本的行为规律是让价值增值最大化,但可能忽视公民福祉和人类利益,如果不设置“红绿灯”,就会野蛮扩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21][51]}。因此,对资本的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法治体系的完善和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还需要深入推进民主治理,需要全社会在新闻媒体、群众意愿、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的力量来源于社会主义的广泛民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德治”,它与法治相辅相成,法治是德治的基础和底线,民主与“德治”是法治实行的社会基础,可以降低法治运行的成本。民主与“德治”水平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党纪政纪的执行情况。因此,倡导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德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24]

四、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征

新发展阶段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具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必须抓住机遇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跃迁创造条件。同时,在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深入结合,并根据中国人口规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来设定中国特色现代化文明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

(一)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

新发展阶段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2]。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2]。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2]。这说明,新发展阶段具有双重的历史使命: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跃迁创造最新的现代化文明条件。

中国进行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是一种新的文明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8]。这五个文明既是以往建设小康社会积累的历史经验,又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未来发展规律的揭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征。

当然,文明发展的最核心标志是生产力,文

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标志也是生产力的升级和改造。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生产力标志呢?从当下可预见的科学技术发展来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改造,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对于这一点,党和国家早就敏锐地洞察到了。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5G通信、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分;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2年1月,《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系统论述了当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形态、产业形态以及对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进一步要求将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着力点,为中国式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9]。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最早出现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2015年,与美国、欧盟等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不小差距。从表1(下页)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ICT服务增加值占世界前十位总和的比重只有11%,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占中国GDP的比重也仅为2.6%。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销售额占GDP比重达到16%,也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2019年,物联网支出占世界比重达到24%,与美国差距不大,但是数据中心数量仅占世界比重的2%,与美国差距较大,反映出主要的数据都存储在美国。但中国很快就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2013年后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加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兴起,为中

国经济社会向数字化全面转型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和知识基础。到2020年,如果仅从一般的信息技术的使用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已经很小。

针对德国的工业4.0计划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举措,中国也加快了制造业升级的步伐,特别是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制造。生产制造与服务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例如,轨道车辆制造企业在物流管理中引进编码设备系统、定位系统、微型立体仓库、自动运送车辆(AGV)等自动化设备。石化炼油企业广泛应用物联网、红外线及机器人技术,建设了全封闭、全自动、无人操作的立体仓库,实现了固体产品包装、仓库作业的自动化管理和无人装车发货。发电企业则开发出各类软件程序对生产的全流程进行实时监控,杜绝各种风险隐患。大量制造业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化工业机器人。

根据UNCTAD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中美两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两个最主要国家,75%的区块链相关专利集中于中美两国,其中中国就持有50%的区块链相关专利;中美两国占有50%的物联网支出、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全球市值最大的70个数字化平台企业几

乎都集中于中美两国。2017年,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德国占有全球73%的机器人销售量,其中中国位列第一,中国和美国也是从人工智能技术中受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美国和日本共囊括了78%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但是就数据中心地区分布来看,仍主要位于发达国家,其中40%位于美国。从全球来看,2017年狭义和广义的数字经济分别约占全球GDP的4.5%和15.5%;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9%和21.6%;在中国,分别为6%和30%。可见,就数字经济基本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和美国基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工业数字化发展方面还存在诸多挑战。例如,工业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智能制造在大型钢铁企业的实现程度最高,但总体水平也不高,且主要是用于安全监控,其他行业的智能化程度还比较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又如,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诸多核心产品和技术面临发达国家的“卡脖子”问题,特别是芯片、光刻机、人工智能技术、工业软件等。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则仍然是不充分、不扎实的。因此,继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并改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仍然是我国现

表1 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单位:十亿美元、%)

经济体	ICT服务增加值 (2015年)	ICT服务增加值 占世界前十比重 (2015年)	ICT服务增加值 占GDP比重 (2015年)	电子商务 销售额 (2017年)	电子商务销售 额占GDP比 重(2017年)	物联网支出占 世界比重 (2019年)	数据中心数量 占世界比重 (2019年)
中国	284	11	2.6	1 931	16	24	2
美国	1 106	42	6.2	8 883	46	26	40
欧盟	697	26	4.3				
德国				1 503	41	5	4
法国				734	28	3	3
英国				755	29	3	6
日本	223	8	5.4	2 975	61	9	
韩国	48	2	3.5	1 290	84	4	

数据来源:ICT服务增加值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信息经济报告2017》^[30],电子商务销售额、物联网支出、数据中心数量的占比数据来自UNCTAD的《数字经济报告2021》^[31]

代化新征程中物质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要争取在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条件下筑牢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基础。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应当具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特征,而且应当考虑中国的实际。其中,最鲜明的实际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最大的实际就是人口规模巨大、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的特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这两个实际,也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特征。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文明深入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源泉和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辉煌。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持续5000年的中华文明,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也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其底色是中国的。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32]。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结晶。

在对待外部世界上,包容和融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

的有机统一。”^[32]中华文明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近代以来,中国曾遭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长期侵略,中华文明受到了重大挫折,这更加坚定了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告诉我们要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在和平发展中取得的,而且反过来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们还很困难的情况下,就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当今世界的主流仍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只能顺应这个历史大潮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走出了一条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根据中国人口规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来自我设定合理预期指标,借鉴但不简单套用其他国家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33]的远景目标,就是根据这个实际提出的预期目标。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于“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概念,通常将七国集团国家或者OECD国家视为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韩国在OECD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其201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万美元。国际社会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指标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绝不能简单照搬。世界上除了美国和日本的人口规模超过1亿人外,其他所有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都是1亿人口以下的

表 2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1 万美元时的资源能源消费情况

国家	达成 1 万 美元年份	人口(亿)	人均水资源 (立方米/人)	人均耕地 面积(公顷)	人均石油 消费量 (吨)	人均天然 气消费量 (立方米)	人均煤消 费量(吨 油当量)	人均核能 消费量 (千瓦时)	人均水电 消费量 (千瓦时)
美国	1978	2.23	12 795.19	1.92	3.91	2 369.88	1.56	1 307.14	1 286.38
中国	2019	14.00	2 077.70	0.10	0.66	278.55	2.01	249.06	931.68
德国	1979	0.78	1 363.99	0.24	2.09	792.31	1.77	666.53	235.31
英国	1980	0.56	2 576.86	0.33	1.44	832.83	1.26	657.56	70.21
法国	1979	0.55	3 471.90	0.58	2.15	440.66	0.58	727.81	1 209.44
日本	1981	1.18	3 630.25	0.05	1.90	214.20	0.54	727.74	738.23

数据来源:EPS 数据库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经济体。中国 14 亿多超大规模的人口以及人均自然资源的不足,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我们决不能走单纯追求价值增值和资本暴富、疯狂攫取自然资源的道路,更不能走掠夺别国资源的道路。表 2 显示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和耕地面积明显小于其他国家(不包括日本),而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 万美元时,除个别国家和个别能源外,中国的各类资源能源的消费量明显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说明,我们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经验、具备了一定比较优势,只要我们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生态环境友好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之路。

五、结语

本文旨在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因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孕育了不同生产力水平的文明形态,现代化文明的要素生成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探究社会发展阶段与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规律,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功课。为此,本文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阶段经典论述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现代化探索经验,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机理、经验以及发展趋势,进而揭示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是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更高社会发展阶段跃迁创造最新的现代化文明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准备了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基础,而且还是一种新的文明创造。世界本身是一个由不同文明实体组成的、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具有 5 000 年历史的灿烂文明。但是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话语霸权,把西方的价值观、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普世化,甚至唯一化和神话,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欧美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然而,非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一模式的过程中屡屡碰壁。按世界银行统计,在 1960 年的 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 2008 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只有 13 个^[34]。对于更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现代化模式可望而不可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无疑打破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式道路的唯一选择的神话,从而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选择。它说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35]“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

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36]。**Reform**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001).
- [2]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1(9).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67.
- [7]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 [8]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90.
- [9]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0] 管新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66.
- [1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2.
- [1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3.
- [14]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4.
-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 [16]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12.
-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 [19] 董志凯,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73.
- [20]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02).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22]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EB/OL].(2021-01-17)[2022-07-06].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2201/t20220117_1826479.html.
- [23]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
- [24]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001).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4.
- [26]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N].人民日报,2021-08-18(001).
- [27]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
- [2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 [29]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求是,2022(2).
- [30] UNCTAD. Information economy report 2017:

- digitalizati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M].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17.
- [31]UNCTAD.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cross-border data flows and development [M].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2021.
- [32]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N]. 人民日报, 2021-03-13(001).
- [34]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M].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13.
- [35]《求是》杂志编辑部. 指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献[J]. 求是, 2021(5).
-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7.

The Stag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New Civiliza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EI Chang-hong LIU Hong-kui

Abstract: The classic exposition of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have built a soli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theory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marks the gradual maturity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period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a unique generation mechanism,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s to create new conditions for modern civiliz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o a higher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mong them,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t we should also start from the real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the seriousness of China's huge population and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refor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ndicators of moderniz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but they must not be simply copied. The suc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of world significance. It provides other countries with a new choice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stage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 well-off society;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forms of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 罗重谱)